

(第12辑)

RESEARCH REPORTS ON THE POLITICS OF
CONTEMPORARY CHINA



当代中国政治 研究报告

深圳大学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 / 编
主编 / 黄卫平 汪永成
执行主编 / 陈家喜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第12卷）



当代中国政治 研究报告

中国政治学研究会 编
主编：王世明、王绍光
副主编：王绍光、王世明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CHINA SOCIAL SCIENCE PRESS

(第12辑)

当代中国政治 研究报告

深圳大学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 / 编

主编 / 冀卫平 汪永成

执行主编 / 陈家喜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报告. 第12辑/黄卫平, 汪永成主编;
深圳大学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编.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
出版社, 2014. 1

ISBN 978-7-5097-5579-2

I. ①当… II. ①黄… ②汪… ③深… III. ①政治改革-
研究报告-中国-现代 IV. ①D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012800 号

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报告 (第 12 辑)

编 者 / 深圳大学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
主 编 / 黄卫平 汪永成
执行主编 / 陈家喜

出 版 人 / 谢寿光
出 版 者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西城区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 3 号楼华龙大厦
邮政编码 / 100029

责任部门 / 社会政法分社 (010) 59367156
电子信箱 / shekebu@ssap.cn
项目统筹 / 王 绯 李 响
经 销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市场营销中心 (010) 59367081 59367089
读者服务 / 读者服务中心 (010) 59367028

印 装 / 三河市尚艺印装有限公司
开 本 / 787mm × 1092mm 1/16
版 次 / 2014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097-5579-2
定 价 / 85.00 元

印 张 / 24.25
字 数 / 413 千字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执政党的建设

社会大转型与中国共产党的角色转换	赵虎吉 / 3
中苏俄政治改革战略的比较分析	
——政治主导权和改革战略的相互作用	唐 亮 / 19
中层设计与中国的改革	储建国 梁欣超 / 49
组织制度化：中国共产党的政党活动和中国政治发展初探	程 熙 / 73
权力监督和制约的党内处理方式	
——以新加坡 2012 年议员绯闻为例	张 波 / 88

政治民主实践

试论有效开发多党合作的政治资源与制度资源	浦兴祖 / 103
基层“本土化”协商民主的逻辑演进及现代性内涵	赵成斐 / 119
人民政协与社会主义协商民主	
——“发挥人民政协作为协商民主重要渠道作用”的	
政治学解读	肖存良 / 136
2012 ~ 2013 年上海人大代表间接选举观察报告	
——基于前六届“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	
获奖项目的定量研究	邱家军 / 155

地方政府创新

中国地方政府创新的类型与趋势（2000 ~ 2012）	
——基于前六届“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获奖项目的	
定量研究	何增科 / 177

地方治理的“双轨共治”趋势

——基于地方政府创新的初步观察 徐晓全 / 195

大部制改革中的自我建构与改革误区 董 阳 / 206

公共组织改革

制度设计与中国反腐败

——以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与党政领导干部
 选拔任用制为例 Melanie Manion 袁柏顺 / 225

谁是平衡发展最好的政府

——对全国 336 个地区的绩效评估 樊 鹏 / 234

当代中国行政机构升格现象研究 张金阁 / 258

选拔制下干部年轻化的挑战与极限

——以改革开放以来中央委员会平均年龄变化为例
..... 杨小辉 顾 闻 / 279

底层政治发展

制造确定性：中国城市社区选举中的违规操作现象分析 李 辉 / 303

私人治理

——以豫东城郊 L 村为个案 刘 锐 / 312

当代中国社会抗争的发展及其治理 唐元松 / 327

台湾政治变迁

公民意识、社会正义认知与政治参与 陈陆辉 陈映男 / 343

论两岸统一过渡期和平发展法律框架 范宏云 刘 明 / 369

社会大转型与中国共产党的角色转换

赵虎吉

执政党的建设

一、特殊国际环境下的特殊角色

社会转型的内容一般可概括为六个方面：经济转型即工业化；社会转型即城市化；政治转型即民主化；文化转型即世俗化；组织转型即科层化；观念转型即理性化。社会转型从特殊意义上说，是用以特指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换和变迁，而这种“传统—现代”的社会转型是以“现代化”为核心内容的。

后发展国家的现代化是在特定的国际环境中启动和推进的。国际环境，与一个国家在国际社会中所处的地位有关。后发展国家的发展环境，可用“先进—落后”二元结构来描述，即发达国家的现代化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水平，而后发展国家的现代化则远远落在发达国家的后面。“先进—落后”二元结构环境使后发展国家的现代化过程具有不同于发达国家的一系列特征。

第一，追赶性。这一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起点低，但有明确的追赶目标。其次，其发展进程主要不是创新过程，而是从发达国家那里采借现代性因素的过程，采借的是最新或较新的现代性因素，因此，有可能避免“黑暗中的摸索”，缩短发展进程。再次，经济社会的发展过程不是自然历史过程，而是对来自外部挑战的积极回应，是追赶发达国家的大规模的、国家行为。追赶性现代化有其特定的政治要求。首先，要由强大的政府启动

社会大转型与中国共产党的角色转换

赵虎吉*

一 特殊国情国家的社会大转型与中共的特殊角色

社会转型的内容一般可概括为六个方面：经济转型即工业化；社会转型即城市化；政治转型即民主化；文化转型即世俗化；组织转型即科层化；观念转型即理性化。社会转型从特殊意义上说，是用以特指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换和变迁，而这种“传统→现代”的社会转型是以“现代化”为核心内容的。

后发展国家的现代化是在特定的国际环境中启动和推进的。国际环境，与一个国家在国际社会中所处的地位有关。后发展国家的发展环境，可用“先进一落后”二元结构来描述，即发达国家的现代化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水平，而后发展国家的现代化则远远落在发达国家的后面。“先进一落后”二元结构环境使后发展国家的现代化过程具有不同于发达国家的一系列特征。

第一，追赶性。这一特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起点低，但有明确的追赶目标。其次，其发展进程主要不是创新过程，而是从发达国家那里采借现代性因素的过程，采借的是最新或较新的现代性因素，因此，有可能避免“黑暗中的探索”，缩短发展进程。再次，经济社会的发展过程不是自然历史过程，而是对来自外部挑战的积极回应，是追赶发达国家的大规模的国家行为。追赶性现代化有其特定的政治要求。首先，要由强大的政府启动

* 赵虎吉，中央党校政法部，教授。

和主导发展进程。追赶性现代化不是自然历史过程，而是对来自外部挑战的积极回应，是突然启动的大规模的行为过程。这种过程民间力量是无法启动和主导的。其次，要求由那些具有强烈的发展志向且又具有现代科学知识的精英集团掌握政权。

第二，外源性。外源性是指现代化的初期和中期所需的资金、技术和市场在国外。追赶性现代化在短期内需要大量的资金和技术，而大部分资金和技术在国外。现代化的初期和中期尤为如此。产品的大量出口，即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在现代化的相当一段时期内，主要靠产品的低价格和经济因素之外的特殊条件。因社会经济组织的能力所限，在现代化的相当一段时期内，引进外资和技术的任务只能由政府来承担。资源配置，即如何将资金和技术有效地同生产过程相连接，也要由政府来完成。这就要求政府不仅是强大的政府，同时又必须是高质量的理性的政府。此外，政治稳定是引进资金和技术的前提条件。任何外商都不愿在政治混乱的国家投资或转让技术。

第三，急剧性。后发展国家的现代化是短期内的急剧的变革过程。首先，是短期内的革命性的变革过程。后发展国家的现代化是传导型巨变，是短期内追赶先进发达国家，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变的革命性的变革过程。其次，短期内的革命性的变革过程必然是解体与整合的矛盾运动过程，具有中断性和过渡性特征。它是历史发展中的一种连续性中断，是历史发展两个前后连续性变迁的中断，但这个中断并不是对历史、传统的虚无化和完全否定，而是历史发展过程辩证否定的一个环节，它遵循“扬弃”的法则，是历史进程中连续性和非连续性的统一。由于这个过程是革命性的变革过程，它始终贯穿着经济结构、政治结构、社会结构、文化结构的解体与整合的矛盾运动。而这个过程并非是“新的来，旧的走”的单纯的和直线的“好事一起来”的过程，而是新旧交织在一起，交错在一起并进行博弈的极为复杂的过程。社会的整合水平、一体化水平不断下降，社会经常面临整合危机和一体化危机，政治稳定经常受到威胁。转型社会蕴涵着新与旧、传统与现代、旧同一性与新同一性之间的矛盾和冲突；蕴涵着社会结构各种因素转型变革不同速率的落差性、不平衡性和相互制约性以及边界的模糊性；蕴涵着新旧转换过程中的“旧辙已破，新轨未立”的无序性、多变性、不确定性和失范性；蕴涵着社会系统结构自组织力量对这种无序性和失范性的整合要求。再次，短期内的急剧变革过程，又必然导致一系列的不均衡发展，如增长与分配的不均衡、贫富的不均衡、产业间的不均衡、地区间的不均

衡、经济发展与政治发展的不均衡等。这些不均衡导致一系列的不满，进而导致政治不稳定。这些特征要求由强有力的政府驾驭控制全局和发展进程，确保政治稳定，有序、渐进地推进发展进程。

第四，动员性。后发展国家的现代化是由政府自上而下地动员社会、综合使用国力、有计划地推进现代化的过程。首先，后发展国家的现代化不是自然历史过程，而是由掌握国家政权的政治集团自上而下地动员和组织社会的过程。其次，是在发达国家全方位的示范效应之下，由政府综合使用国力，以求效力最大化的过程。再次，政府直接介入并主导经济活动和社会发展进程。计划是政府主导经济和社会发展进程的主要手段之一。这个特征也有特定的政治要求。首先，强大的政府是制定和推行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的基本前提条件。其次，政治权力的高度理性化是设计切实可行的发展目标并制订正确的发展计划的基本条件。再次，要求决策程序和过程合理化和科学化。

第五，全面性。全面性有两层意思：一是，由于发达国家全方位的示范效应，后发展国家自觉地或被迫地将现代化的各项任务同时展开，即它不是社会某些局部的变化，而是社会结构的整体性变迁，它的表现、影响涉及人们社会生活和精神观念的方方面面；二是，由于发达国家全方位的示范效应，后发展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始终面临着期望与满足的矛盾，进而面临一系列的政治不稳定。此外，由于发达国家的示范效应，后发展国家自觉或被迫将现代化的各项任务同时展开。这就要求政府具有强大的能力，有效地驾驭和控制整个发展进程。由于发达国家全方位的示范效应，期望远远高于满足。一方面，期望为发展提供动力，而另一方面，超前发展的，甚至是畸形发展的期望往往成为政治不稳定的重要潜在因素和社会秩序混乱的重要原因。这一特征也要求由强大而高效率的政府来维持政治稳定并为社会提供社会正常运行所必需的一系列公共产品。^①

我国的国内环境可以表述为“强国家—弱社会”二元结构。我国有独特的基本国情。首先，我国有五千年的悠久历史，其中两千多年是统一的主权国家，而国家结构是中央集权制的大一统国家。发展是继承与创新结合的结果。传统的影响不是人们的主观意志所能控制的，我们无法回避历史传统对现代的影响。正因为发展是原有基础上的发展，两千多年来的中央集权制

^① 赵虎吉：《比较政治学：后发展国家视角》，中山大学出版社，2002，第343～350页。

的政治传统是我国政治发展的基础，也是对我国政治发展影响最大、最长远
的变量。其次，我国是 13 亿人口、960 万平方公里的超大规模国家。再次，
我国又是超复杂结构的国家。地区间的自然环境差异、发展差距、文化差异
巨大，且又是由 56 个民族组成的多民族国家。在市场经济、信息化、全球
化时代，特别是在社会大转型过程中，如何将超大规模和超复杂结构国家整
合成一个整体并建立和维持良好的秩序，是摆在我们面前的历史性课题。

新中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经过长期的武装斗争而建立起来的。
新中国成立时，中国共产党已经掌握和控制了绝大部分的各种政治资源。
此外，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化水平很高，对全国的覆盖面和渗透力极强，
任何政治组织都无法与之比拟。由此，我国形成了“强国家—弱社会”的
二元结构环境。建党 90 多年，党员人数达 8500 万名以上的超大规模的
中国共产党，以民主集中制为基本组织原则、个人服从组织、下级服从上级、
全党服从中央，即内聚力、覆盖面和渗透力极强的中国共产党是超复杂结构、
超大规模的我国既能保持统一—稳定，又能高速发展的最重要的政治因素。

二 从“利益代替”到“利益代表”：转换中的中共角色

权力中心从毛泽东转移到邓小平之后，中国的政治价值目标发生了巨大
变化，随之出现了改革开放的新局面。如下表所示，邓小平的政治价值观不
同于毛泽东。夺取政权之前，毛泽东从中国的现实出发，指出了中国革命的
道路和方法。获得政权并大致巩固新政权后，毛泽东偏向于理想主义，把中
国推进理想主义实验场。理想主义必然地引出了第二个价值理念，即理念主
义。在毛泽东那里，马克思主义等理念性价值比安全、福利等国家治理的实
体价值更为重要。这两个价值理念又必然地带出了第三个价值理念，即国家
主义。当国家、集体、个人之间的利益发生冲突时，集体、个人必须服从国
家利益。

毛泽东和邓小平政治价值观比较

毛泽东	邓小平
理想主义	现实主义
理念主义	事实主义
国家主义	社团主义

在邓小平的政治价值观中，现实比理想重要得多。国家的未来，即理想当然很重要，但现实更重要。理念很重要，但安全、福利等国家治理的实际效果比理念更加重要。邓小平用著名的“黑猫白猫”论阐述了这个价值观。邓小平通过政府政策，展示了国家、集体、个人紧密合作才能利益最大化的价值倾向。

随着基本价值观念的转变和改革开放的深化，中国的国家与社会、政府与企业、中央与地方关系发生了巨大变化，甚至是根本性变化：改革开放前，社会成员没有任何选择权，其选择权全部集中到国家手中，个人的一切被动地听命于国家的安排。改革开放后，选择权完全回到了国民的手中；改革开放前，企业只是生产组织，而不是经营组织，其经营权在政府手中。改革开放后，经营权回到了企业，使企业成为微观经济活动的主体；改革开放前，地方政府只是中央权力的传导系统。而改革开放后，地方政府在承担中央权力的传导系统角色的同时，也承担地方利益代表的角色。权力（权利）关系的上述变化带来了个人、企业和地方政府巨大的行为动力。

上述变化带来了民众、企业、地方政府巨大的行为动力，而这些动力与随着对外开放而从境外引进的大量的资金、技术、市场和管理方式相结合，产生了巨大的生产力，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

上述变化可以表述为中国共产党的“利益代替”角色开始向“利益代表”转变。所谓“利益代替”，是指民众利益的代表权完全由执政党垄断和代替，由执政党替民做主、替民安排一切，民众把一切权利完全交给执政党，一切听命于执政党。这种利益代替执政方式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执政党高度垄断利益代表权，即“替民做主”。第二，权力单向运行。执政党垄断利益代表权，即利益代替。执政党与民众的这种关系，决定了权力只能自上而下单向运行，自下而上的权力监督不可能存在。第三，不存在纠错机制。权力的单向运行也导致了纠错机制的缺失。一切都是执政党说了算，无法形成任何试错反弹机制。

“利益代表”可以从三个方面表述：第一，执政党代表民众利益，而不是代替民众利益。综合并表达民众利益的主渠道依然是执政党，但是民众也可以通过其他渠道表达自己的意愿。民众认为执政党尚未为自己表达出来的利益，由民众自己通过一定渠道表达。第二，权力有限双向互动。执政党依然掌握大部分权力资源和权力，但并没有垄断一切权力资源和权力，即权力集中，但不是垄断。随着大量经济资源转移至社会，随着利益的多元化和社

会结构的不断分化,相当一部分权力分散到社会之中,执政党与民众之间形成了一定程度的权力双向互动,这也为建立纠错机制奠定了基础。第三,开始形成纠错机制。纠错机制的关键在于权力主客体之间的双向互动。权力主客体之间有限的双向互动,为纠错机制的形成提供了可能。

笔者认为,改革开放前我国政治体制的基本特征是:正式制度层面的“利益代表”制度规定与非正式制度层面的“利益代替”同时并存。正式制度明确规定了人民当家作主,如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等。中国共产党综合和集中表达人民利益,并通过人民代表大会与人民代表进行沟通,执政党的意志转变为国家意志。这些正式制度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利益代表”角色,体现了人民的参与和执政党与人民之间权力的双向互动。但是在实际政治过程中,“利益代表”角色变成了“利益代替”角色,执政党垄断了人民的利益表达权,人民当家作主变成了执政党“替民做主”。^① 改革开放使这种格局开始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即“利益代替”角色开始向“利益代表角色”转换。

三 角色专门化:巩固“利益代表”角色的基础

政治角色的专门化是政治角色规范化、制度化、程序化的前提。如图1所示,我国政治体制的静态特征是双重双轨政治结构:人民选举产生全国人大,形成最高权力机构;全国人大选举产生并监督国务院;国务院对社会进行管理。这是一个权力轨道。单从这个轨道看,我国已建构了相当完整的类似于议会内阁制的民主政治制度:各阶层、各民族、各年龄段、各性别的公民享有平等的政治权利,由他们选举产生最高权力机关全国人大;人大选举产生政府并讨论决定重大问题;政府贯彻执行人大的决定并对社会实行管理;人大监督政府;人民定期改选全国人大代表;人大定期改选政府组成人员。我国的政治体制还有一个权力轨道:党员代表人民;党员选举产生党中央;党中央对人大、国务院实行领导;国务院对社会实行管理。这样,权力获得和权力运行形成了第二个轨道。此外,与同级政府并行,又有同级党委。各政治机构内部又有党的组织,如全国人大党组、国务院党组等。这

^① 关于“利益代替”角色向“利益代表”角色的转换,请参阅赵虎吉《重构政治价值:中国政治发展的内在属性与发展逻辑》,《学习与探索》2011年第1期。

样，形成了另一个权力运行轨道，使执政党权力国家化、行政化并形成了政治体制的双重双轨结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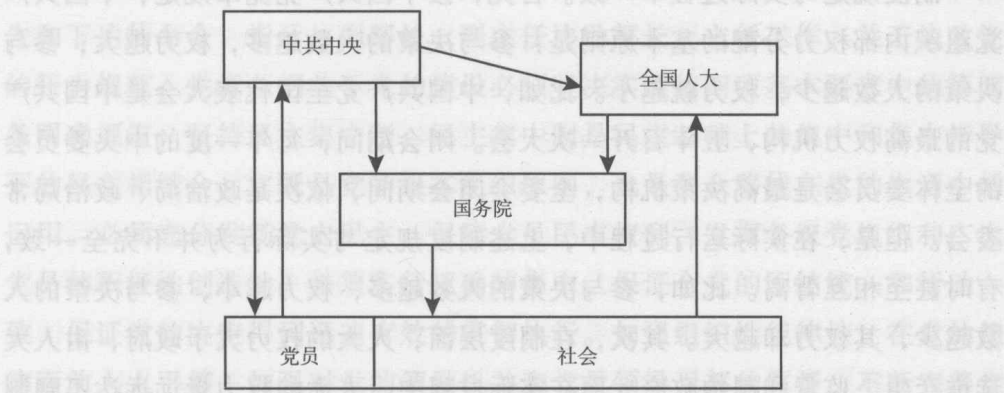


图1 双重双轨政治结构*

* 此图最初是由北京大学的李京鹏教授在 20 世纪 80 年代末的课堂授课中首次使用的。

执政党权力的国家化和行政化意味着中国共产党同时担当三个角色：一是执政党角色，即利益表达、利益综合、提出政策意见；二是代议角色，按特定价值目标的方向，协调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利益冲突并制定相关法规，通过相关决议，任免政府组成人员等；三是行政角色，即将代议机构的意志和执政党的意志转换成具体的政策，管理各类行政事务。因此，在横向上，中国共产党之外的各政治机构的自主化、专门化水平很低，特别是人大。首先，人大作为最高权力机构，拥有立法、决策、人事、监督等职能。履行这些职能，需要高水平的自主化和专门化。目前，我国人大尚不具备这些条件。其次，各政治机构之间的制约机制很不健全。全国人大因其自主化水平低，其权力量不足，无法在事前、事中、事后全方位地监督政府行为。执政党中央、全国人大、全国政协、国务院等机构之间，只有执政党自上而下地对其他各政治机构实行单向的领导和监督，不存在各机构之间互动的相互制约机制。这种状况是双重双轨政治结构的必然结果。

在纵向上，不同层级政治机构的自主化水平很低。执政党和政府的各层级之间，基本上是单向的命令服从关系。下级组织的行为目标由上级组织的行为目标分解而来，下级组织的权力是上级组织权力的延伸。改革开放之后，特别是 1997 年的税制改革之后，我国的中央与地方及地方各层级之间

的关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地方党委和地方政府的权力量有了大幅度的增加。但是，中央地方关系的基本属性依然是单向的命令服从关系。

制度规定与实际过程不一致。首先，按中国共产党党章规定，中国共产党组织内部权力分配的基本原则是：参与决策的人数越多，权力越大；参与决策的人数越少，权力就越小。比如，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是中国共产党的最高权力机构，五年召开一次大会。闭会期间，每年一度的中央委员会的全体委员会是最高决策机构，全委会闭会期间，依次是政治局、政治局常委会。但是，在实际运行过程中，上述制度规定与实际行为并不完全一致，有时甚至相互背离。比如，参与决策的人数越多，权力越小，参与决策的人数越少，其权力却越大。其次，在制度层面，人大的权力大于政府，由人大选举产生、监督和制约政府，而在实际过程中，人大的权力量远远达不到制度规定的权力量。再次，按宪法、政府组织法规定，政府的基本组织原则是首长负责制，但是，政府运行的实际行为原则却是集体领导分工负责制。这样，制度规定与实际过程之间形成不一致状况。

缺乏严密而系统的程序、规则。制度只规定每一机构的权力量及由此而形成的与其他机构之间的关系。程序和规则是制度在实际运行中的行为规范，也是各个政治主体实际行为过程中具体的和明确的行为规范。只有制度而没有详尽、明确的程序和规则，制度将是一纸空文。我国政治体制的基本特征之一就是只有制度规定而缺乏严密而系统的程序、规则。首先，缺乏严密而系统的规则。比如，党代会代表和人大代表议决某项议案时，一名代表能否就同一个议案发言两次或三次，每一次发言可以讲多长时间等，均没有详尽的规定。其次，规则缺乏封闭性。封闭性是任何一种规则的生命。规则的封闭性是指规则辐射范围的全方位性和权威性，即任何人都必须在规则的辐射范围之内。有些人必须遵守规则，而另一些人可以不遵守规则，规则将失去权威性，人们总是想尽方法绕开规则，而不是自觉遵守。目前，我国政治生活中仅有的一些规则缺乏封闭性。

在同一个政治系统中，不同角色承担不同的功能，因此各有各的行为规范。关于全国人大的组织原则，我国宪法第三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机构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我国宪法第86条明确规定：国务院实行总理负责制。各部、各委员会实行部长、主任负责制。国务院组织法第二条规定：国务院由总理、副总理、国务委员、各部部长、各委员会主任、审计长、秘书长组成。国务院实行总理负责制。总理领导国务院的工作。副总

理、国务委员协助总理工作。国务院组织法第九条规定：各部、各委员会实行部长、主任负责制。各部部长、各委员会主任领导本部门的工作，召集和主持部务会议或者委员会会议、委务会议，签署上报国务院的重要请示、报告和下达的命令、指示。副部长、副主任协助部长、主任工作。关于执政党的行为规范，党章总纲关于党的建设必须坚决实现的四项基本要求中的第四条明确规定：坚持民主集中制。民主集中制是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相结合。它既是党的根本组织原则，也是群众路线在党的生活中的运用。必须充分发扬党内民主，保障党员民权利，发挥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的积极性创造性。必须实行正确的集中，保证全党的团结统一和行动一致，保证党的决定得到迅速有效的贯彻执行。加强组织性纪律性，在党的纪律面前人人平等。加强对党的领导机关和党员领导干部的监督，不断完善党内监督制度。党在自己的政治生活中正确地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在原则问题上进行思想斗争，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努力造成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党章第二章党的组织的第十条第五款明确规定：党的各级委员会实行集体领导和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的制度。凡属重大问题都要按照集体领导、民主集中、个别酝酿、会议决定的原则，由党的委员会集体讨论，作出决定，委员会成员要根据集体的决定和分工，切实履行自己的职责。

如上所述，从静态角度讲，我国的相关法规对执政党、代议机构和行政机关的行为规范都作了明确规定。但是，从实际政治过程的角度看，上述法规交织在一起，甚至相互冲突，各行为主体的角色边界变得模糊不清。执政党全党的基本行为原则是民主集中制，而各级委员会的行为规范则是集体领导分工负责制。如上文指出，中国共产党的组织渗透在人大、政府等各个重要的政治组织之中，且处于领导地位并实际承担执政党、政府、代议机构的多种角色，执政党自身的行为边界和行为规范模糊不清。比如，各级党代会的运行原则似乎是民主集中制，但各级委员会实际运行原则则是首长负责制，即一把手负责制。执政党的行为边界和行为规范的不确定必然导致其他角色的边界模糊。比如，政府行为原则的法律规定是首长负责制，而在实际运行过程中的政府原则却是集体领导分工负责制，有时是多种原则的混合。

中共十七大指出：坚持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提高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保证党领导人民有效治理国家；坚持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从各个层次、各个领域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最